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 ChatGPT 时代的权力悖论

王金良，叶文杰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上海松江，201620)

摘要：通过引入空间视角，探索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权力格局所产生的悖论式影响。一方面，ChatGPT 等技术促进了资本的狂飙与空间剥夺，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空间霸权，催生速度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各行为体的良性管控下，在国家层面，ChatGPT 等技术能够促进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全球层面，通过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ChatGPT 有助于建构“全球空间在场”，最终形成协商化的“空间赛托邦”。权力自身具有中心化的倾向，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变革“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从而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关键词：ChatGPT；权力；空间；空间赛托邦；空间赛维坦

中图分类号：TP18；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4)02-0171-12

一、问题的提出

ChatGPT 是一种“对话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具有生成“拟人性”语言文本的“智能性”。它使用大规模无标签样本在大型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进而通过强化人类反馈(reinforcement learning human feedback, RLHF)以实现微调，欲推动语言大模型与人类意图的一致性，实现人机对齐。ChatGPT 作为突破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瓶颈的“阿拉丁神灯”，将会给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新一轮的变革，影响人类社会的权力格局。本文将重点探讨 ChatGPT 对于人类权力格局的影响。

已有学者分析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权力格局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人工智能衍生出了网络权力、数据权力与算法权力，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1]在社会

治理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治理从“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2]人工智能催生出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超级权力”，精英进一步垄断了话语权和知识生产。^[3]GPT 技术具有极强的公民赋权效应，但最终也有可能导致新的技术统治和资本统治。^[4]在智能政务的运用方面，ChatGPT 在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公民参与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算法歧视与技术依赖等权力集中化的风险。^[5]在丰富治理资源、达成社会共识、充分回应社会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助力，但也在公民隐私和公平难题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6]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7]，促进了政府在效率、道德及公平等方面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善治^[8]。

在国际层面，人工智能在数据化、算法化及自动化三个层面建构出全球性的暴力^[9]，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向一个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10]。

收稿日期：2023-06-28；修回日期：2024-01-08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方案研究”(2021FZX008)

作者简介：王金良，男，河北磁县人，政治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全球治理、比较政治学，联系邮箱：Uwj1@sina.com；叶文杰，男，江西婺源人，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政治学理论

ChatGPT在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实力发展及军事安全等层面,会进一步拉大科技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11]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加快国家间的数字技术竞争节奏,并提高全球数字技术扩张的风险性。^[12]随着类ChatGPT社会化应用的不断加速,由利益驱动的个体和集团可能会误用、滥用GPT而形成技术霸权主义,最终导致技术鸿沟和资本操控,形成并加剧新的不平等。^[13]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又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分享国际权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民族国家的权力逐渐向国际社会拓展。^[14]有效运用人工智能,还能够帮助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国际冲突和极端主义等全球复杂问题。^[15]因而,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权力的集中化与去中心化的悖论式格局。^[16]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意识形态与权力的隐蔽性渗透是通过“建筑”这一空间完成的。^{[17](64)}他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场域。^{[18](46)}当下,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权力紧密纠缠^{[19](5-10)},将会逐步替代建筑在空间生产中的支配性地位。空间是人工智能与权力无法绕过的场域,以往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引入“空间”这一重要视角。

本文拟通过引入空间视角,分析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权力的关系。文章提出,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替代了建筑在空间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处于权力场域的空间形成了极权式与协商式的双重面孔。借用高奇琦教授提出的“赛维坦”和“赛托邦”两个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所生产出的双重空间面孔。“赛维坦”指的是“赛先生”与“利维坦”的结合。“赛先生”原本是带领人们走出黑暗时代的温文尔雅的先士,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加速,发展成为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巨型怪兽——“赛维坦”。^[20]人们也可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协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其在正常的轨道上前进,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整体和谐,这一理想的社会形态则可以被称为“赛托邦”。“赛托邦”的实现应当在协商、平等、共

识等原则的指引下展开。^[21]可以看出,“赛维坦”和“赛托邦”具有权力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引入“空间”这一重要元素,进而提出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空间生产中形成了中心化的“空间赛维坦”与去中心化的“空间赛托邦”,二者形成了权力悖论的格局。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以驯服“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将“权力悖论”转为“权力向善”。

二、空间生产的技术转变及其双重面孔

空间生产所依赖的“技术”具有政治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22]因此,“技术”实质上扮演着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表征的角色。人类通过技术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与再生产,建构出具有政治性、社会性与心理意义的空间。空间在自我生产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极权与协商的双重面孔。空间生产所依赖的技术已由“建筑”技术转变为“人工智能”技术,在ChatGPT等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下,逐步演变成中心化的空间赛维坦与去中心化的空间赛托邦。

(一) 空间生产的技术转变:由建筑技术转变为人工智能技术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之前,人们大多生活在建筑所建构的物理场域中,列斐伏尔认为“都市建筑”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建筑的习性直接承自上天的理性,而在那时天意仍然支配着真理的统一,支配着理性和信仰的统一。”^{[17](381)}“包括建筑模块和造型法——更确切地说,即建筑的顺序和配置——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方法的学习,一种既是对术语又是对于具体事物(或者‘被赋予意义的事物’)的真正的体系化。”^{[17](399-400)}换言之,建筑技术通过形塑空间内部的结构而赋予具体事物意义。“空间实践和作为实践的建筑之间是密切关联的、互相表

达的。”^{[17](401)}在列斐伏尔所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统治通过建筑技术在空间生产上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并使得空间成为资本积累、幸存和统治的工具。^{[18](2-19)}进言之,空间生产中充斥着符号暴力与意识形态霸权,权力与空间紧密交织。^{[17](63)}

技术的革新使得空间与权力之间紧密纠缠,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替代建筑技术,成了空间生产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力^{[19](1-3)},其并非一个纯粹的技术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制度、政治与文化的综合体,同时也生产着社会关系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23]人工智能所生成的空间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领域,国家主权拓展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4]赛博空间逐步占据了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公民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数据化的方式生存,人们的生活逐渐由数据建构,所有的生活都变得与数据有关。^[25]人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赛博空间中进行互动,可能会改变人性善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26]赛博空间实质上已成为与物理空间孪生的新型空间^[27],可以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映射,也形成了一系列新形态的空间属性。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形成的线上社会并非虚拟社会^[28],将赛博空间与物理空间相分离的理念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浪漫想象^[29]。换言之,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所生产的并非只是赛博空间,而是虚拟与现实相交融的空间。由此,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替代了建筑技术在空间生产中的核心地位。人工智能技术、空间与权力紧密交织在了一起。

(二) 空间的双重面孔: 规训式的极权空间与肯定性的协商空间

空间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充满权力规训式的极权面孔,同时也具有协商式建构的一面。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列斐伏尔等思想家对空间的极权式面孔进行了批判。福柯认为在学校和监狱等建筑空间中,微观权力对空间进行着分割、排列和监视,建构起一整套弥散性的、持久

的、无所不在且具有绝对支配性的等级监视网络。在规训的建筑空间内,国家运用权力对身体进行监视与规训:“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各种级别相吻合……一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30](130)}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国家潜在暴力的载体。“摩天大楼,特别是傲立楼群的公共与国家建筑,它那拔地而起、垂直耸立的气势……向旁观者传达了权威和威慑的印象。垂直性与巨大的高度,向来是潜在暴力的一种空间表现。”^{[17](144)}数字世界逐渐演变成一种规训空间,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依赖的算法逐渐成为一种规训人类的“超主体”,这时赛博空间所展现的是暗含着极权式微观权力的空间。但通过建构一种主体间性的有效互动,便可构建对算法和资本权力的结构性监督,形成协商式的空间。^[31]

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空间同样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呈现为一种肯定性的协商式空间。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能力的提升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空间的生产与运转。^[32]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等空间治理实践。国土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所共同组成的国家主管辖空间,不仅是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客观物质资源,而且是人民美好生活所依托的社会环境。^[33]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是科层制政府对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等政策的发展权利不断进行配置革新的空间治理体系。行政区划不仅是广袤国土的简单地理划分,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间基础,背后隐藏着稳定的科层权力运作与利益划分的制度化逻辑。^[34]网格化管理是政府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将社区人为地划分为管理空间单元,致力于实现治理精细化和资源整合的基层治理系统。^[35]当下的网格化治理强调“人民民主”的服务理念,“满足公共需求”的治理目标,“双向互动、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以及“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36]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的空间实践和网格化管理都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格局,以平衡国家、社会和市

场的空间需求。在国家的空间治理中,空间中的多元主体通过协商推进既有空间利益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空间正义。^[37]在空间生产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促使政府实时与其他权力主体互动,扩展了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空间,实现了空间的协商化。^[29]

综上,人工智能等技术生产的空间不仅仅是贯彻权力意志的载体,同时也是多元主体进行对话协商以实现空间正义的场域。

(三)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双重空间面孔: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

在空间生产中,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了中心化的极权式空间与去中心化的协商式空间。相比于以往的人工智能技术,GPT 技术具备更加复杂的架构与革新意义的训练机制(如 Transformer 自注意力机制下的 Token 和 Vector),具有生成性和拟人化等特征,也更接近人机对齐的目标,ChatGPT 也因此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用户对 GPT 技术的依赖与联系也更为紧密,GPT 等新技术更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政治生活。因此,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权力格局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代替建筑技术,成了空间生产中的核心载体。由此,人工智能、空间与权力紧密交织。在空间生产中,作为新一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 在权力的集中与去中心化上都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效果。基于此,我们可以将 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权力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状态概括为“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

一方面,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自主发展会促使市场(资本)与国家权力联合,压缩社会的权力空间。它的开发与应用离不开资本的支撑与市场的运转。拥有雄厚资本的科技巨头会占据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进行空间剥夺。通过与科技公司的合谋,欧美等发达国家生产出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霸权。ChatGPT 也促使科技强国建构起对弱国的空间霸权,加速建构出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政府的管控与社会的良性运用下,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可提高科层制的韧性化,国家话语阐释权向社会和市场弥散,即能实现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空间中的良性运用,可以促进多元国际行为体进行协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最终形成“空间赛托邦”。

三、空间赛维坦:ChatGPT 与权力的中心化

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全球的数据进行随意的抓取和训练,促进了科技寡头公司的资本再集中。资本具有的剥夺性与空间形成了共谋,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空间霸权紧密交织。同时,它也会促进时间与空间的融合,形成加速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衍生出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

(一) 资本与空间剥夺

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及其日常运转都需要高端的研究平台与雄厚的资金。国盛证券于 2023 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ChatGPT 需要多少算力》估算:以 ChatGPT 在 2023 年 1 月的独立访客平均数 1 300 万计算,其对应芯片需求为 3 万多片英伟达 A100GPU;初始投入成本约为 8 亿美元,每日电费在 5 万美元左右,训练一次大概需要几百万美元。如此之多的资金消耗与算力成本是中小型科技公司无法负担的。ChatGPT 的运转需要以海量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的获取与训练需要强大且先进的算法、算力,顶尖的人才培养与资本的大量投入。凭借科技经济实力形成的垄断地位,OpenAI 等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主导权。同时,这些科技公司与资本形成了共谋,利用资本的再生产进行空间剥夺,无形中挤压了其他行为体的发展空间。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所缔造的空间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新容身之所。根据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空间首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空间的功能意味着规划和战略,因为“生产关系的这种再生产不再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同步;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18](32)}。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主要集中于生产和

劳动场所, 后来则逐步演变成了城市里的娱乐、居住和教育场所, 现在则演变成人工智能技术建构的与现实所紧密交织的赛博空间,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也将逐步走向空间生产的核心舞台。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再生产并再巩固着“监视资本主义”与空间剥夺。“监视资本主义”是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社会景观, “数据化”是监视资本主义的核心。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行为成为商品”与“监视即服务”的过程, 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全面攫取各种数据、信息和情报以创建一个隐蔽性的全球监视体系和监控模式, 最终维护和巩固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38]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 资本加强了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关系变得更加隐蔽。2023 年 1 月, ChatGPT 的月活跃用户数已达 1 亿, 成为史上用户数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 都与世界性的整个空间相关。”^{[18](138)}科技寡头公司通过攫取用户的数据, 使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驱动下, 资本与空间的共谋关系更加紧密, 强化了资本的空间剥夺。人们在使用 ChatGPT 时, 其个人信息、偏好等都会被 ChatGPT 所在的公司收集。这些数据和信息被挖掘、整合、分析、解码并建构成一套套结构化的符码, 最终缔造出支配、监视并宰制人的权力场域。科技寡头公司也可能会将个人用户的消费习惯和偏好等数据售卖给其他企业, 以共同获得利益。这进一步强化了科技寡头公司的财富汲取能力, 进而又重新对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进行再分配。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将可能进一步加深全球财富的不公平性分配, 为空间赛维坦的建构奠定物质基础。

(二) 国家意识形态与空间霸权

空间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 国家作为权力宰制与意识形态表征的空间也是如此。福柯认为多样化的空间是国家、资本通过现代化权力的再生产所塑造的, 这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权力的规训。权力通过对空间的占有、分割与型构, 以知识和话语为媒介, 形成可以进行权力再生产的场域(field)。^{[30](195)}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权”也具有权力规训的

意义。“文化霸权”指的是国家内部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智识的、思想的、道德的及教育的方式, 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服从并自动融入该社会集团的权力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39]“空间霸权”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为理论根基, 但其适用范围不限于国家内部。空间霸权指的是科技寡头公司及欧美发达国家利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再生产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 致使本国民众或者其他国家认同其合法性并受其支配, 并主动融入这种权力结构之中。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分割并控制着空间, 运用数据和算法解构着人对自身的理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人具有脆弱性和依赖性, 但人与人之间应当实现共同体的善及人类的共同善。^[40]ChatGPT 可能利用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 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收集、整合与编码, 强化人类对技术的依赖, 解构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与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似乎可以实现“人机对齐”, 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设计意图相协调, 与人类的语言及思维方式实现协调统一, 符合人类整体的发展需求。但是, 在 ChatGPT 这一“逻各斯纽带”的背后, 可能无法实现不同空间中个人的友好交流与融合, 而是打造出了一个个空间区隔。人们接受的是愈加狭窄的信息, 似乎自愿地进入了一个个串联在一起而又互相分隔的信息茧房。ChatGPT 强化了国家对空间的分割与控制, 成了实现人类共同善的阻碍。随着技术的迭代与更新, ChatGPT 与人类之间的对话会更加拟人化, 对人类更具有吸引力, 进而人们可能会对 ChatGPT 产生情感交互与依赖。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播, 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以人与 ChatGPT 为核心的情感交互。人不仅仅崇拜 ChatGPT 背后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法和算力, 甚至还会陷入对 ChatGPT 的克里斯玛式的依恋与崇拜。ChatGPT 将会构建出赛博空间对现实空间的空间霸权, 使人们陷入技术之魅的牢笼。这并不利于人从现代化下理性牢笼中的“单向度的人”转变成具有价值性的“双向度的人”。根据 ChatGPT 的这一特性, 一些非善的国家政权可能会垄断对国家治理的话语阐释权, 建构出对社会领域的空间霸权。

ChatGPT促进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空间霸权构建。它内在地具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在人机交互中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公民对ChatGPT产生的情感依赖会导致人们迷失在赛博空间之中。与ChatGPT的沟通会间接影响人的意识与价值判断,支配并重塑人们的惯习,实现国家对社会空间性支配。ChatGPT所生成的信息由其模型的内在结构、算法选择及用于预训练的海量参数和数据库所决定,其公司可以有选择性地植入符合其偏好的数据或修改算法结构。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中,政客可以与科技寡头公司进行交易,或者通过政治权力对科技公司进行施压,要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训练过程中植入对其有利而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数据。^[41]通过改变ChatGPT的算法结构及敏感词等,政客可以获得竞选优势。由此可以看出,ChatGPT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政客可以利用它进行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建构,最终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空间霸权构建。

(三) 空间帝国主义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促进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霸权的再生产。科技强国对弱国建构空间霸权,这就是空间帝国主义。这时,人工智能所实现的目标就是霸权与帝国主义的旨向。^[42]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所进行的空间生产,科技强国对弱国建构起空间帝国主义,即“空间”与“帝国主义”的共谋。空间帝国主义的主体是科技寡头公司及霸权国家,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依靠雄厚的资本,通过新技术再生产出具有意识形态霸权的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某些国家则可能认同这种霸权秩序并受其支配,主动融入其世界等级结构。霸权国家可以通过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意识形态与空间霸权的再生产。

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促进空间帝国主义的再生产。ChatGPT用户的数据会被科技公司所俘获,这些数据包含了使用者的个人喜好等较为隐蔽的私人信息。ChatGPT等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所用来训练的数据是公开的海量数据,当用户频繁使用后,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将会穿透公域与私域的网络数据壁垒,将公域数据和私域数据进行整合。这些数据最终都被科技寡头公司及霸权国家所俘获、整合并创建出结构化的符码体系,以进行权力宰制与霸权建构。

因此,科技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数字鸿沟会进一步加深,主要表现在数据的获取、整合和应用能力上,这也就加剧了科技领域的空间失衡。此外,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在ChatGPT与人类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也塑造着意识形态霸权。例如,ChatGPT在评价中国的气象气球飞入美国领空这一事件时,它“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美国会认为这是一种军事威胁,最终对双方都不利。然而,在评价美国战机进入中国南海时,它的回答是如果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则应受到肯定;如果是美国刻意发起挑衅,则是不受欢迎的。^①因此可以看出,标榜着中立的ChatGPT实质上蕴含着意识形态霸权。进言之,如果用户询问的是其他日常的且难以辨别的问题,ChatGPT生成的答案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空间帝国主义的建构。当不同国家的用户沉浸于其中时,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再生产。因此,科技强国对弱国建构的空间性符号暴力与空间霸权会愈加凸显。

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时间与空间的紧密交织,建构出加速化的“空间帝国主义”。“空间”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并不代表对时间的摒弃。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应对资本扩张所引发的“时空压缩”效应,会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推迟资本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第二种则是通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发新的生产力和市场等来进行空间领域上的转移。^[43]这两种方式统称为“时空修复”。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认为技术革命更改了人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观感”,他将时间范畴引入空间,对权力范式的转型与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时空感知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44]他提出的“速度-空间”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空间形态,是“速度”在技术进步之极限处所展开的最终空间结构。光速通信技术实现了不同空间的实时远程共在,缔造出极权主义的速度化“空间帝国”。^[45]作为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应用加快了整个世界变迁的节奏,加速了空间帝国主义的型构。

ChatGPT的技术革新促进了空间帝国主义的速度化建构。2023年3月23日,OpenAI官方增

加了 ChatGPT 的插件使用功能, 可以进行联网, 功能更加多元化与便捷。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从 GPT-3.5 进化到 GPT-4, ChatGPT 在性能上有了极大的提升, 具有了更高质量的数据和参数, 以及更广泛的知识 and 更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as)从“社会加速批判”的视角指出, 科技的发展似乎提高了工作效率, 可以让人们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以寻求自身的主体性, 而非被客体化。然而, 事实上科技的光速迭代使人们的生活处于一种时空加速的状态之中。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频革新导致“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46]。人们可能会迷失在技术革新带来的所谓快乐与便捷之中。^[47]ChatGPT 对公域与私域数据实现了光速化的抓取与运用, 实现了远程空间共在, 进而也就促进了空间帝国主义与“空间赛维坦”的加速形成。因此, 这种由速度与空间的共谋所形成的空间帝国主义使得人们无处遁形, 人类在无形中被“空间赛维坦”的锁链所束缚。

综上所述,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资本的共谋形成了空间剥夺, 再生产着国家意识形态与空间霸权, 在全球层面也生成了加速化的空间帝国主义。它们最终融合在一起, 型构出空间与权力紧密交织的“空间赛维坦”,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权力高度中心化的“空间怪兽”。

四、空间赛托邦: ChatGPT 与权力的去中心化

在“空间赛维坦”下, 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 他们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48]然而,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和社会等行为体的良性运用下, 又可以促进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 带来国家自主性的弥散, 推动全球善治的实现。政府和国家在保护公众数字权利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 建构出“全球空间在场”的格局, 为实现“空间赛托邦”这一愿景提供了可能。

(一) 空间的扁平化与科层制的韧性化

ChatGPT 可以缩短国家与社会沟通的空间距

离, 提高国家治理中政府的回应性, 实现空间的扁平化。它可以促进政务信息的高效率 and 高质量整合, 快速精准地回复公众对政府的意见与需求, 从而降低政府筛选、汇总和整合信息的成本。它也可以将公众需求转化为结构化的大数据, 为政府的高质量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 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ChatGPT 依据其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和对话技能可以有效促进政府间的协同合作、信息共享, 提高公众的自组织能力。^[49]总之, ChatGPT 提高了政府在纵向空间中的信息传递效率, 促使科层制趋向扁平化, 也促进了横向上的空间协同发展。

科层制走向韧性化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内在需求。克劳福德·霍林(Crawford Holling)认为韧性决定了一个系统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关系, 一个具有韧性的系统假定人们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 支持系统内主体间的异质性和不同选择。^[50]霍林等人将韧性界定为整个系统在面临外来的风险冲击时, 能够有效抵抗干扰, 以保持系统在结构、功能、性质等方面基本不变的能力。^[51]在目前风险叠加的社会中, 科层制表现得笨拙、僵化、缺乏韧性, 具有强国家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层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 他们认为专家官僚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为大众追求正义的代表, 而是通过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支配权力。^[52]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看来, 科层制的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形成了高度的一体性, “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 “今天, 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53]。然而, 在科技不断革新的当下, 科层制不应被完全摒弃, 而应当建构一种韧性化的科层式治理模式。笨拙僵化的、强国家式的、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科层制应当进行变革, 需要促进政治行动者的能动性生成与社会的主体性建构。科层制作为国家权力与社会的稳定纽带, 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

ChatGPT 嵌入国家治理之中, 能够有效提高科层制政府的韧性, 提升政府对风险社会的适应及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实现空间治理的扁平化。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府治理中, 能够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提供治理决策、提升公共治

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推动治理精细化及强化政府监管等。^[54]具体来说, ChatGPT 有助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与公共产品的提供。ChatGPT 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微观主体的意愿, 全方位获取公民的爱好和需求等信息, 提供精准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这不仅缩短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距离, 促进了空间治理的扁平化, 也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情感属性。同时, ChatGPT 还能为政府提供与制定公共决策有关的各类数据信息, 推进国家决策的智能化和精准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促进政府的创新能力, 建立更加有效的决策模式, 发现并且解决结构性的不平等。^[8]政府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 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变局与国家环境变迁中的风险叠加^[55], 塑造出韧性化的科层制政府, 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柔性化发展及空间治理的扁平化发展。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科层制纵向上的空间扁平化与空间治理的韧性化, 有助于搭建与巩固“空间赛托邦”。

此外, 科层制持久存在的原因是人们对价值的迷恋而非权力的斗争, 即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的内在动力。^[56]虽然 ChatGPT 作为技术嵌入了科层制后, 可以实现科层制的韧性化, 但也不能完全迷恋技术, 因为技术无法消弭人们“为承认而斗争”的价值需求。

(二) 空间的协商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

ChatGPT 能够提升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促进空间的协商化进展。迭代革新的科技充当了人们表达诉求的媒介。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激励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首先, ChatGPT 强大的信息采集能力能够帮助公民了解政治参与中所涉及的程序、法律法规及各项公共政策等, 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更加高效和便捷。其次, ChatGPT 可以成为代表与选民之间沟通的辅助工具。ChatGPT 除了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训练以外, 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可持续性的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能够更好地吸收并生成结构化的数据资源。ChatGPT 可以快速且高质量地整合和分析数据, 并针对公民想要了解和沟通的主题提供建议, 为民众与代表之间的沟通奠定技术基础。进言之, 它可以增进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情感

联结, 调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 增强公众、社会组织和企业对国家立法过程的信任。最后, 基于 ChatGPT 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 公民在与社会组织、企业的互相交流与协商过程中, 可以预先向 ChatGPT 进行咨询, 这样就能对公共事务有更为清晰和深入的了解。ChatGPT 实现了社会、市场与国家等不同空间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总之, 空间不再仅仅是强国家的场域, 由人工智能技术所赋能的空间生产同时也能够提升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能动性, 塑造出协商式的民主空间, 以期实现“空间赛托邦”。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能会导向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能够独立于社会制定政策的能力, 即国内层面上的国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经典定义是: “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 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只有国家确实能够提出这种独立目标时, 才有必要将国家看作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57]ChatGPT 能够促进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之间的交流, 促进协商化空间的再生产。因此, 社会与市场可以通过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国家决策, 以期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当下, 国家自主性的弥散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国家治理后, 不仅弥散了国家的自主性, 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ChatGPT 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元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化空间的建构, 政府的回应性也得以提升。社会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治理中的叙事权。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 Francois Lyotard)认为叙事是组织社会的重要形式, 是现代性的基础。“语言游戏”指的是不同的叙事类型在不同话语中以不同的规则为依据, 这些规则能够判断不同种类话语的合法性。^[58]社会组织与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通过 ChatGPT 进行政治参与, 也就参与了“语言游戏”规则的制定。在治理绩效较高的国家中, 应当更加注重塑造柔性化的、国家与

社会达到协调关系的基础性权力。ChatGPT 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商, 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及非国家行为体在“语言游戏”中的叙事话语权。然而, 对于国家建构任务都尚未完成的国家, ChatGPT 的闯入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其政治秩序, 导致政治衰败。这些国家的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建设, 更罔论“语言游戏”中的叙事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的重塑。

(三) 风险超载与“全球空间在场”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引发了风险的全球化, 生成了相对于空间领土化与治理辖区化的民族国家的风险超载。例如, 全球贫困、粮食短缺、气候变暖、传染病及跨国数据监管等问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都演变成了“超载的风险”。在当下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中, 治理的空间辖区化严重限制了善治的实现。^[59]面对全球性问题中的风险超载与治理辖区化之间的张力, 不同国际行为体应当建构起“全球空间在场”的治理思维与治理理念, 即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旨归, 促进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空间协商化, 以实现国家善治与全球善治。“全球空间在场”并不是各向同性的“全球空间”, 而是由有着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行为体良性互动与交流而形成的协商化和平等化的“全球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秩序的建构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60]国家与市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中良性合作, 能够有效避免科技强国演变为霸权国家。^[61]

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中, 可以缓和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超载与治理赤字, 建构起“全球空间在场”。

其一, ChatGPT 有助于国际机制的良性运转。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辅助人工智能技术, 它可以帮助国际组织、国际专家及跨国公司等行为体更加精准地处理和分析海量且非结构化的数据和信息, 更好地进行全球公共决策。位于不同空间中的多元国际行为体也应当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管, 以成功且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创造一个一致的、对全球有利的监管环境。^[62]

同时, 通过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各类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法律和政治文化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和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处理, 可以为全球性的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智力咨询, 提高全球协商的能力和效率。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时, 在过程上应当实现各行为体共同协作的全球合智, 在目标上应当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发展和各国互助的全球善智。^[63]

其二, ChatGPT 有助于塑造全球公民精神和全球共识。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和解释, 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了解和协商。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处于平台期, 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出现了相互封闭的“蜂窝化”空间状态, 亟需全球价值理念的孕育与成熟。^[64]ChatGPT 就像全球空间中的一根“逻各斯”纽带, 可以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联结起来, 孕育全球价值理念, 促进全球主义共同体的构建。当下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以明确的领土空间范围来确定权力行使边界的“领土国家”, 而是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社会相互依赖、高度依存的“世界主义化国家”(cosmopolitanized nations)。^[65]因此, 世界应当建立起具有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格局, 在多边主义的条件平衡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利益关系, 孕育全球公民精神, 并防止全球公地悲剧的发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等技术,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语言屏障, 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沟通与交往, 促进协商化全球秩序的生成。良性运用 ChatGPT, 才能打破国家主义的锁链, 逐步走向“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66]。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建构起“全球空间在场”, 最终为塑造“空间赛托邦”提供物质基础与价值空间。

五、结论

总之, 人类欲走出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所形成的权力悖论, 即驯服并变革“空间赛维坦”, 驶向“空间赛托邦”, 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类的主体性, 对科技的发展与运用进行有效的监管。2023 年 7 月 13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不仅在总则中强调国家可以通过“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同时也鼓励公民进行监督管理，“使用者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67]2023年10月1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指出：“各国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68]这都可以视为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主体性反思与监管。现代化与科技的发展形成了加速化的世界社会，生成了异化的世界关系和被客体化的人。罗萨为异化所开出的药方便是“共鸣”，即人与人、人与理性、人与物形成良好的共鸣关系。^[69]但是他认为异化与共鸣不是完全对立的，人类欲实现共鸣的世界，需要经历异化与共鸣的不断转化与共存，实现共鸣就要激发出人的主体性。换言之，改变世界不能完全摧毁现有秩序的根基，而应当进行渐进性的变革。因此，想要真正走向“空间赛托邦”，并不能直接、极端地摧毁“空间赛维坦”，而是要通过发挥人类的主体性去渐进地改良“空间赛维坦”，建构起国家善治与全球善治的“全球空间在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空间赛托邦”，最终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注释：

- ① ChatGPT 所生成的答复都是在撰写本文时所生成的。ChatGPT 的答复会根据用户的反馈及其所受到的算法操控发生变化。因此，之后向 ChatGPT 询问相同问题时，它可能会生成与本文中的答复相比更加科学与中立的内容。

参考文献：

- 叶娟丽, 徐琴.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 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8(1): 46-55.
- 王小芳, 王磊. “技术利维坦”: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潜在风险与政府应对[J]. 电子政务, 2019(5): 86-93.
- 庞金友, 陈梦雪. 智能入场与民主之殇: 人工智能时代民主政治的风险与挑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9(4): 9-20.
- 高奇琦. GPT 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秩序、赋权与创新的框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 147-156.
- 陈潭, 刘璇. 智能政务 ChatGPT 化的前景与隐忧[J]. 电子政务, 2023(4): 36-44.
- 高奇琦. 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7): 81-102, 206.
- KÖNIG P D, WENZELBURGER G. Opportunity for renewal or disruptive forc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ters democratic politic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20, 37(3): 101489.
- MARGETTS H. Rethinking AI for good governance[J]. Daedalus, 2022, 151(2): 360-371.
- RICAURTE P. Ethics for the majority world: AI and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at scale[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2, 44(4): 726-745.
- 封帅.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 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 35(1): 128-156.
- 黄日涵, 姚浩龙. 被重塑的世界? ChatGPT 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J]. 国际安全研究, 2023, 41(4): 82-106, 159.
- 戚凯. ChatGPT 与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J]. 国际论坛, 2023, 25(4): 3-23, 155.
- 许源源, 陈智.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社会化应用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韧性治理研究——以 ChatGPT 为例[J]. 电子政务, 2023(9): 39-49.
- 许开轶, 邵彦君. 人工智能推动国际权力扩散的路径探析[J]. 江海学刊, 2021(1): 130-137.
- GRISOGONO A M. How could future AI help tackle global complex problems?[J].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2020(7): 50.
- 叶娟丽, 徐琴. 去中心化与集中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悖论[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6): 1-12.
-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2 版.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BARTOLETTI. An artificial revolution: On power, politics and AI[M]. London: The Indigo Press, 2020.

- [20] 高奇琦. 人工智能: 驯服赛维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277-280.
- [21] 高奇琦. 人工智能 II: 走向赛托邦[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 214-223.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02.
- [23] CRAWFORD K. The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8.
- [24]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EB/OL]. (2016-12-27) [2023-10-31]. http://www.cac.gov.cn/2016-12/27/c_1120195926.htm.
- [25] 张宪丽, 高奇琦. 人工智能时代公民的数据意识及其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 38(12): 211-216.
- [26] 张宪丽, 高奇琦. 透明人与空心人: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性的改变[J]. 学术界, 2017(9): 81-92, 325.
- [27] ZOOK M. The ge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40(1): 53-78.
- [28] 何艳玲, 张雨睿. 线上社会治理理论纲[J]. 东岳论丛, 2022, 43(8): 135-143, 192.
- [29] 何艳玲, 张雨睿. 孪生空间, 平行治理: 网络空间塑造中国城市治理新议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5): 60-74.
- [30]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31] 张宪丽. 数字世界中的共有凝视: 从福柯和拉康出发的思考[J]. 学习与探索, 2022(12): 50-59.
- [32] 杨雪冬, 陈晓彤.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间逻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5): 24-35.
- [33] 黄征学, 黄凌翔. 国土空间规划演进的逻辑[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 8(6): 40-49.
- [34] 匡贞胜. 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何在? ——基于 EHA-Logistic 模型的实证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 13(4): 22-40.
- [35] 孙柏瑛, 于扬铭. 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审视[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4): 65-71, 79.
- [36] 姜晓萍, 焦艳.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J]. 理论探讨, 2015(6): 139-143.
- [37] 颜昌武, 杨怡宁. 什么是空间治理?[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9(1): 20-31.
- [38] SHOSHANA Z.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12-14.
- [39]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58-279.
- [40] ALASDAIR C.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M].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5.
- [41] KANE T 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olitics: establishing ethics[J]. 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 2019, 38(1): 72-80.
- [42] KATZ Y. Artificial whitene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7.
- [43]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7-124.
- [44] VIRILIO P, BRATTON B H. Speed and politics[M]. New York: Semiotext(e), 2006: 11-29.
- [45] 卓承芳. 维希留“速度—空间”概念及其意义[C]//陆兴华, 张生. 法国理论·第八卷.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2: 126-128.
- [46]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戡,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译者前言 7.
- [47]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5-15.
- [48] 颜昌武, 叶倩恩.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 一个批判性审视[J]. 学术研究, 2022(2): 51-58, 177.
- [49] 于文轩. ChatGPT 与敏捷治理[J]. 学海, 2023(2): 52-57.
- [50]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1): 1-23.
- [51]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5.
- [52] 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张国清,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译者的话 4-5.
- [5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导言 5-8.
- [54] 张夏恒. 类 ChatGPT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 价值、风险及其防控[J]. 电子政务, 2023(4): 45-56.
- [55] GILL A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ong view[J].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33(2): 169-179.
- [56] 张乾友. 权力还是价值: 官僚制何以持久存在[J]. 探索与争鸣, 2023(1): 81-89, 178.
- [57] 埃文斯, 鲁施迈耶, 斯考克波. 找回国家[M]. 方力维, 莫宜端, 黄琪轩,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0.
- [58] 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

-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6-79.
- [59] 杨雪冬, 陈晓彤. 风险超载、治理“辖区化”限度与善治的空间路径[J]. 治理研究, 2021, 37(3): 74-85.
- [60] DAFOE A.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72(1): 121-126.
- [61] HOROWITZ M 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8, 1(3): 36-57.
- [62] ERDÉLYI O J, GOLDSMITH J.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posal for a global solution[C]//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AAAI/ACM Conference on AI, Ethics, and Society, 2018: 95-101.
- [63] 高奇琦. 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7): 24-48, 156.
- [64] 杨雪冬. 全球价值理念的生成机理初探[J]. 东北亚论坛, 2020, 29(4): 72-84, 128.
- [65] BECK U, LEVY D. Cosmopolitanized nations: re-imagining collectivity in world risk societ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3, 30(2): 3-31.
- [66] 蔡拓.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0): 4-29, 156.
- [67]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 (2023-07-13) [2023-11-0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68]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EB/OL]. (2023-10-18) [2023-11-03]. http://www.cac.gov.cn/2023-10/18/c_1699291032884978.htm.
- [69] ROSA H.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M]. Berlin: Suhrkamp, 2016: 341-541.

Sciviathan of Space and Scitopia of Space: The power paradox in ChatGPT age

WANG Jinliang, YE Wenjie

(School of Govern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aradoxical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on the patterns of human power.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atGPT promotes capital's soaring expansion and spatial deprivation, constructs spatial hegemony under national ideology, hastens the parturition of globalized spatial imperialism, and eventually creates an authoritarian "Sciviathan of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joint benign control of various actors or agents, ChatGPT can promote the flattening and negotiation of spa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resilience of the bureau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t the global level, by promoting equal negotiat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agents, ChatGPT helps construct "the presence of the whole global space", hence ultimately forming a negotiated "Scitopia of Space". Power itself has a tendency to be centralized, and human beings need to exert their own initiative to change the "Scitopia of Space" and sail to the "Sciviathan of Space", so as to transform the "power paradox" into the "power for good".

Key Words: ChatGPT; power; space; Scitopia of Space; Sciviathan of Space

[编辑: 郑伟]